

“云审判”怎么审？

新华社 孙亮全 周闻韬 吴文韬

窗口可以关,服务不能停。

疫情期间,“网上见”的“云审判”成为各地法院工作的新模式。“云开庭”、VR“云调解”、网上“云执行”,初具雏形的智慧法院审判体系显现出提升效率、方便群众、推进审判体系现代化等多重优势。

“云审判”的大规模应用,是疫情期间的“权宜之计”,还是未来的“常态之策”?

“云审判”应对刚性需求

4月22日,北京四中院在线公开合并审理一起行政案件,房山区司法局等部门负责人通过北京法院审判信息网远程旁听。

“疫情期间,司法需求没变。窗口关了,但一些服务仍有刚性需求。”一名法官介绍,北京为此紧急研发了“云法庭”系统,开启三级法院统一的互联网庭审模式,可支持全市800个法庭同时开庭。

记者采访了解到,疫情防控期间,为及时处理案件、尽快解决问题,“云立案”“云调解”“云庭审”等线上司法手段在各地得到广泛运用。

“由疫情引发的案件,如妨害公务、诈骗等违法犯罪案件,要从快处理,这样有助于匡扶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疫情防控大局。”重庆五中院民一庭副庭长胡智勇说。

在常规案件中,有羁押和审理期限的刑事案件,也需要紧急处理。“比如农民工工伤案件和刑事二审案件,不及时处理可能会损害当事人利益。”太原中院刑三庭庭长杨晓宇说,“程序需要继续往下走,一些网上能做的就放到了网上。”

在重庆,一场场特殊的“隔空”提讯也在陆续进行。不久前,重庆五中院刑事审判庭连续5天通过远程视频方式,在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及上诉人处于不同场所的情况下,对关押在9个看守所的58名嫌

疑人完成了所有提讯程序。

“云审判”对民事案件的意义更为重要。“民事案件的主要目的是解决问题,程序更简单,完全可以利用技术手段把当事人召集起来,开视频会议解决。”太原中院民一庭庭长刘光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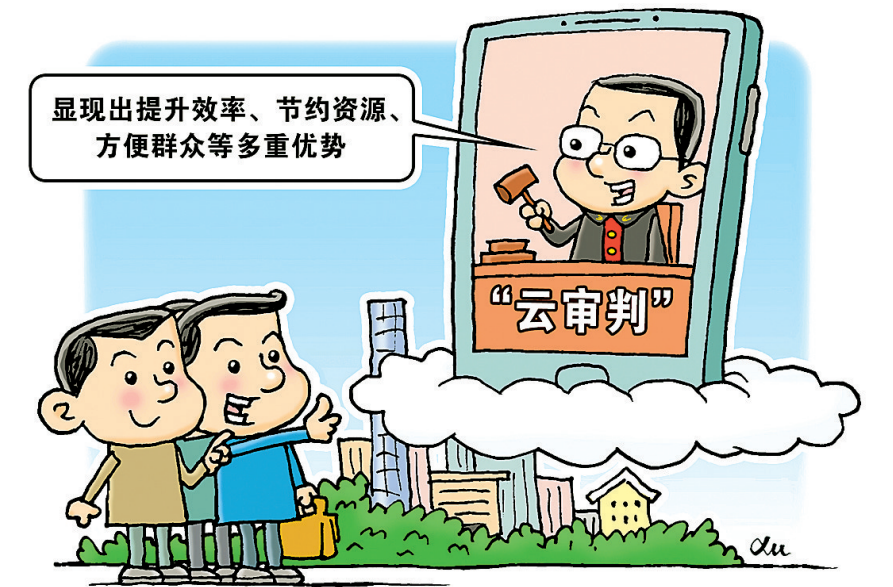
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总结:疫情防控期间,全国法院网上立案136万件、开庭25万次、调解59万次,电子送达446万次,网络查控266万件,司法网拍成交额639亿元,执行到位金额2045亿元。

“云审判”有多重优势

不少业内人士表示,在过去几年信息化建设应用的基础上,疫情加速了远程开庭、网上立案、移动微法院和“云执行”的布局和应用。智慧法院审判体系初具雏形,并显现出提升效率、节约资源、方便群众等多重优势。

山西高院刑三庭副庭长赵宏说,刑事案件中,被告人羁押在各地,过去审判人员必须去当地提审。以山西高院刑三庭为例,办理一件简单的刑事案件,法院最少需要4人,检察机关最少需要3人,还有一到两名辩护人。“这么多人,来回最少得两天;转到‘云上’,大家在各自岗位,半天就够了。”

一些法官表示,“云审判”相当于直播,对法官业务能力等各方面要求更高,能倒逼法官提高水平、改进作风、规范司法程序,有助于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



代化。

同时,实行“云审判”,公众可以“网络围观”,有利于把对审判权的监督落到实处。

山西一位业内人士称,“云审判”提高了当庭宣判率,保障了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现在山西各级法院涉疫情防控类案件一般会当庭宣判,从司法改革角度说,这是“还权”于合议庭,提升了司法效率。

“云审判”下一步怎么走？

一些基层法官预判,随着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合同解除、合同违约等纠纷有可能增加,旧案叠加新案,审理压力会增加。“云审判”对缓解案多人少矛盾、应对案件增长可提供有力支撑。

但与此同时,当前“云审判”仍面临软硬件不到位、案件容量有限、技术人才紧缺等局限。

一位基层法院庭长表示,当前很多基层法院硬件并不到位,软件也常因故障无法高效使用。“20分钟左右的在线庭审有时需要1小时,庭审中还常出现签不上笔

录或当事人无法登录的现象。另外,由于没有人脸识别系统,全靠视频判断,也存在一定司法风险。”

胡智勇说,目前在线审判平台受容量限制,支持办案数量有限,法院需提前预约“云法庭”,有时存在拥堵、排队现象。

此外,不少法院缺少既懂法又懂技术的复合型信息化人才。现阶段法院信息技术人员大多是计算机专业毕业,难以将网络技术和法院管理有机联结起来,亟需进一步加大技术开发与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投入。

西南政法大学人工智能法学院院长陈亮建议,一方面要从制度上保障各类司法主体自由选择诉讼形式的权利,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做好普及宣传,增加社会对网络判案等智慧法院系统的了解。此外,还要从立法层面,对在线庭审的案件类型、程序要点、证据展示等规则进行进一步细化和完善。

业内人士认为,不能把“云审判”的大规模应用仅当作疫情期间的“权宜之计”,应抓住这一契机,多方面发力,推动我国智慧法院建设水平不断提升。

警惕！不良信息正在入侵网络课堂

新华社 王井怀 白佳丽

疫情改变了特殊时期全国广大中小学生的上课方式,更会长久影响学生的上网习惯。记者调查发现,现在无论是上网课还是课堂多媒体教学,学生学习环境已全面网络化,与此同时,软色情、暴力、游戏甚至诈骗等不良信息也随之投放到学生面前,严重影响学生健康成长。专家认为,要以更严格措施为学生营造干净的网络学习环境。

软色情信息“弹”入课堂

不久前,山西省忻州市一学校,教师王慧(化名)刚开始讲课,学生突然哄堂大笑。王慧回头一看,吓了一跳,电子白板一角赫然出现一位衣着暴露的年轻女子。

“课堂多媒体教学是联网的,经常有软色情、暴力、游戏广告弹出来,这给学生的影响非常不好。”王慧无奈地说。

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5月发布的《2019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46.0%的未成年网民遭遇过各类不良信息。其中,淫秽色情、血腥暴力等内容占比均在20%左右。

天津市和平区岳阳道小学副校长马宏认为,随着网课和课堂多媒体教学的普及,这些不良信息正在侵入课堂。“有些不良信息,拦截软件拦不住,只能靠老师手动去关闭,有时还会长时间停在屏幕右下角,让学生们分心。”

记者梳理发现,不良信息主要以弹窗

广告形式“霸屏”,让儿童误入歧途。今年4月,贵州一名小学生网课期间因为好奇点开不断弹出的游戏广告,结果花掉母亲6000多元。5月,天津市地方法院审理一起未成年人猥亵儿童案,作为法律援助方的天津市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付佳直言:“未成年人性犯罪与弹窗广告中的暴力、色情信息密切相关。”

弹窗广告为何缠上学生

弹窗广告是PC端网络为主流时的老问题,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这一问题又向移动网络蔓延。

弹窗广告在业内一直争议很大。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副院长左晓栋认为,弹窗广告备受网民批评但长期存在,是监管部门与广告业妥协的结果。“我国互联网生态基本是免费的,一些网站、软件只能以流量变现、广告来养活自己,这成为弹窗广告的动机源头。”

大量霸屏但不容易关闭和包含色情等不良信息的弹窗广告屡禁不止,违法成本

低、惩罚力度弱是重要原因。付佳介绍说,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规定,对弹窗广告违法行为处以顶格罚款,也只有3万元,对违法者的惩戒作用有限。

同时,左晓栋介绍说,弹窗广告是以追踪个人信息为基础的。“这种情况下,广告商可以精准地追踪用户的个人喜好,精准投放。”

特别是,疫情期间大量中小學生通过网络上课,让一些人看到了商机。记者暗访南方一家广告公司了解到,公司以1万元100万条弹窗的价格,通过年龄、搜索记录等方式锁定学生群体,定向精准推送。广告公司负责人李经理直白地说:“学生的钱比成人的钱好赚。”

如何守住一片干净的学堂

多位专家、教师、学生家长认为,疫情前学生上网受到家长、学校管控较多,但疫情发生后,学生的学习、生活等方方面面全方位对接网络,学生与网络的关系更紧密,要尽快为他们打造干净的学习环境。



左晓栋等专家认为,随着社会公众向移动互联网转移,监管部门应该加强对移动互联网上弹窗广告的管理。比如,可以细化规则,要求软件供应商必须明示嵌入的弹窗功能,让用户自己选择。

同时,治理弹窗乱象要加大对不法广告的惩罚力度。北京市京师(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胡荣等人认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网信部门等要加强监管,提高市场监管与管理力度,对违法违规行为坚决惩处,对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部门追究刑事责任。修改相关法律法规,提高违法弹窗广告的处罚上限。

此外,要重视培养小学生的网络素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青少年与教育社会学研究室副主任朱迪认为,现在的学生在网络时代长大,学校、家长要注意培养其网络使用中辨别是非、甄别信息的能力,提升学生合理使用互联网、自觉抵制不良信息的健康心态和习惯。